

冯至

山水斜阳

文坛漫忆丛书

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春兰

封面设计:陶雪华

文坛漫忆丛书

主编 陈青生

山水斜阳

Shansui Xieyang

冯至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)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1·插页 4

字数:250 000

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册

ISBN 7-207-04361-9/1·650

定价:19.70元

主编者的话

陈青生

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，风云翻卷，波澜起伏，阴晴变幻，冷暖交替，总是与中国社会大小气候的闷抑舒畅、严紧宽松相随相和。许许多多痴情文学的男女老少，置身这样的境况氛围，分别以生旦净末丑的角色和追求登场献技，舞文弄墨，斟字酌句，布局谋篇，编织出五音交响、七情洋溢的丽文华章，营造了中国文学绵延发展迢迢长程中不乏自豪、也不乏思索的一段历史景象。不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，先后将各自的文学生涯和文坛见闻付诸笔纸，寄托对流逝岁月的纪念，也为文坛历史留下了雪泥鸿爪，夕拾朝花。这套“文坛漫忆丛书”，便采撷、汇辑了一批著名作家回忆文学历程，怀念文坛师友，追记文坛往事的散文精华。

这些作家，有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代开拓者，也有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的赓续人。他们的文学擅长不尽相同，各人取得的文学成就互有千秋，且不乏在不同文学领域的重要代表。而痴情文学的终生不渝，笔墨生涯的坎坷曲折，文坛交游的见识广博，则是这些作家的共同特点。他们在各自的追怀忆往中，真实地报告了自己的人生和文学经历，坦露了孜孜追求文学“真善美”极致的甜酸苦辣，喜怒哀乐，成败得失；维妙维肖地再现了许多文坛人物的音容相貌，言谈举止，秉性情趣和品格节操；还力求翔实地披露了一批文坛旧事的来龙去脉，前因后果，旁蔓别枝，以及种种外人难知的隐秘情节；

加上不同风韵的文采,真挚至诚的情意,丰厚深长的蕴寓,遂使这些文坛漫忆文章,兼容艺术欣赏和史料考证的双重价值。这样的追昔忆往散文,对历史真相真情的展示,往往比教科书式的学术论著更具体、更周详、更生动、更形象,也更使人信服,以至历来获得众多文学爱好者的喜爱,受到学术研究者的重视。

回顾历史,是对流逝岁月的纪念,也包含对往昔的反思,对经验教训的总结,还有对美好未来的希望。二十世纪帷幕初启时,中国文学表现出弃旧图新、追融世界文学大潮的高远志向。这以后,中外文学交流的规模愈发扩大,中外文学汇融的程度更趋加强,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审美境界也更为宽广高大,从而孕育了众多将传统精华和时代神髓集于一体的文学大家,产生了大批魅力隽永、异彩纷呈的文学杰作。但是,社会的连年动荡,时世的多灾多难,又常常使文坛不得安宁,作家被推上各种斗争的风口浪尖,文苑横遭粗暴践踏,一些年间居然成了司空见惯的平常事。如果没有多年来各种各样的战乱、折腾、禁锢、偏狭,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景象肯定会比现有的更为繁盛绚丽。有一种见解认为,“伟大作品”的产生与作家经历苦难很有关系。中国古代有人说过,《离骚》、《史记》的问世,很大程度缘于作者蒙受深冤奇辱,身心倍尝苦难。另一位古人也宣称,文学家非经苦难、苦恋、苦闷三境,实难写出动人心魄之作。外国也有类似观点。西洋有人将诗人比作夜莺,认为夜莺的生活舒适便不会鸣唱。东洋有人干脆将文学定义为“苦闷的象征”。苦难是一种社会现实,也是一种人所难免的生活经历,它对作家人生道路的择定,对作家思想性情的锻炼,对文学作品外形内涵的熔铸,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将文学佳作的产生与作家经历苦难联系起来,是有一定合理性的。然凡事皆有度,过犹不及也是公认的律理。作家究竟要经受多少苦难才能产生“伟大作品”呢?或者换一个角度设想: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和文坛多少年来总在

期待和呼唤“伟大作品”却又总未如愿，是由于中国作家经受的苦难尚嫌不够呢？还是太多？其实，“伟大作品”的问世，得之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孕育，非独与“苦难”一因相关。再说，即使“苦难”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，以作家饱尝苦难煎熬换取“伟大作品”的产生，也令人觉得过分残酷，这实在有悖于人生本义、人道精神，也偏离文艺原旨，似乎是社会文明落后时代对文学的嘲弄和扭曲。今昔对比，时代毕竟前进了，社会文明毕竟发展了。尽管现在仍难以断言“伟大作品”已经不再需要苦难催生，作家和文坛已经没有苦难等候，但在今天，反对暴戾和愚昧，推崇祥和与安宁，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意愿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以往屈原、司马迁、鲁迅、闻一多、胡风、老舍遭遇的那类苦难，应该不会在中国文坛再现。“文坛漫忆丛书”的各位作家，在文坛上笔耕墨耘、栉风沐雨的时间，都超过半个多世纪，有的更逾七十春秋，他们的经历见识，也包含对于这一点的印证和祝祷。

二十世纪帷幕关闭在即，新世纪帷幕行将开启，中国文学又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，前景光明，任务艰巨。此时，读读历史过来人费心凝血总结的经验教训，听听他们推心置腹的忠言告诫，对我们思考中国文学在新世纪如何继往开来，踵事增华，争取更健美的的发展，从而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这个课题，是可以得到有益启示的。

目 录

主编者的话(陈青生) /1

第一辑

我在四中学习的时候 /3

我读《女神》的时候 /9

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 /14

——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

鲁迅与沉钟社 /20

回忆《沉钟》 /31

——影印《沉钟》半月刊序言

《骆驼草》影印本序 /38

外来的养分 /40

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 /52

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 /59

昆明往事 /63

八月十日灯下所记 /93

郊外闻飞机声有感 /96

从前和现在 /98

- 中国的新诗和外国的影响 /101
还“乡”随笔 /110
——读十本诗集书后
哀心的愿望 /120
——纪念《世界文学》创刊 30 周年
新文学初期的继承与借鉴 /122
纪念《译文》创刊 50 周年笔谈 /126
欣慰与“困惑” /129
谈诗歌创作 /132
我与中国古典文学 /142
——答《文史知识》编辑部问
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 /150

第二辑

- 《北游及其他》序 /157
《伍子胥》后记 /161
《山水》后记 /164
《十四行集》序 /167
《东欧杂记》后记 /169
《杜甫传》前记 /172
《冯至诗文选集》序 /173
《十年诗抄》前言 /174
诗文自选琐记(代序) /176
《琐记》补记 /199
《立斜阳集》引言 /200
《冯至学术著作自选集》自序 /203

第三辑

- 《陈翔鹤选集》序 /207
- 敲鼓与赶车 /214
——《田间选集》代序
- 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序 /218
- 给臧克家信悼朱自清先生 /222
- 忆朱自清先生 /224
- 安娜·西格斯印象 /227
- 笑谈虎尾记犹新 /232
附：冯至讲《鲁迅在北大》（赵镇乾） /236
- 纪念鲁迅要扩大鲁迅研究的领域 /238
- 无形中受到的教益 /242
- 从癸亥年到癸亥年 /245
——怀念杨晦同志
- 谈梁遇春 /255
- 相濡与相忘 /266
——忆郁达夫
- 仲平同志早期的歌唱 /272
- 红樱桃与“红娘子” /277
- 文艺因缘二则 /280
- 海德贝格记事(摘录) /285
- 写序志感 /292
——文坛边缘随笔之三
- 怀念羨季 /294
- 刻苦耕耘 尽瘁终生 /300
- 两段回忆 /303

4 文坛漫札丛书·山水斜阳

肃然起敬 /307

病友赠书 /310

——文坛边缘随笔之八

第四辑

致杨晦信 /317

编后记(冯姚平) /335



第一辑

我在四中学习的时候^{*}

明年是北京四中建校八十周年的纪念。在八十年内它培育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，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。我作为四中的学生于1916年至1920年度过一段值得怀念的青少年时期。那时，四中正从它建校后的第一个十年进入第二个十年，与八个十年相比，可以说是十分辽远的往日了。而且四年的学习，时间也是短促的。但在那既辽远又短促的时期内，国家、学校，以及我个人，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——1919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“五四”运动。

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，以“五四”运动为转折点，这是众所周知的，无须在这里多说。我只想谈一谈学校和我个人的变化。

四中建校于清朝末期，名顺天府府立中学。可能是在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改称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。我于1916年暑假考入四中，学校里房舍一部分还保留着封建官府的格式。走进高台阶的黑漆大门，座北朝南是一座两明一暗的大厅，隔开的一间是校长办公室，打通的两间是教员休息室兼会客室。厅前花木茂盛，这大厅与

^{*} 原载《北京四中建校八十周年纪念册》(1987)，后收入《立斜阳集》。此据《立斜阳集》编入。

其说是办公室，倒不如说像是某某官府别院里的一个花厅。还有位于校内中央的一座小亭，亭上匾额写着“漱石”两个字，我一看见那两个字，头脑里便发生疑问，石头怎么能在口里漱呢？后来才知道这是《世说新语》里记载的晋朝士大夫们故弄玄虚、强词夺理的一种坏习惯，说什么“漱石枕流”，分明用水漱口，却要用石，分明可以枕石而眠，却要头枕流水，而且还说出一番道理。后世有些自命“风雅”的人士，不问根源，不顾实际，只觉得把石和水的作用一颠倒，便意味无穷，引人“美感”，于是按照附近有石或有水的不同情况，在园林中亭阁的匾额上题写“漱石”或“枕流”等字样，这是屡见不鲜的。四中的这座小亭，想必是顺天府府立中学初建时的建筑，“漱石”二字，我后来虽然知道了它的出处，但它对于中学和中学生有什么意义，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，日久天长，我对它也就不加理睬，它好像丧失了它的存在。

一排几大间单调而呆板的课室，半中不西，充分显示出清末民初时毫无风格的建筑“风格”。还有两排分割为三四十间的宿舍，里边住着家属不在北京的教师和来自外省外县的学生。我前三年住在亲戚家里作走读生，很羡慕住宿同学的生活比较“自由”，经过一番努力，我在最后的一个学年也迁入学校。使人难以忘却的是课室南的校园，那里春秋两季每天清晨是一片读书声；课室北有高大的槐树成荫，因而学校里当时惟一的一个课外组织叫作槐荫会。学校在十周年纪念时，曾以槐荫会的名义举行过一次盛大的游艺会，招待教育界人士和学生家长。“槐荫”虽不像“漱石”那样不切实际，但它没有时代特点，也体现不出任何教育方针。这个会，我不知它始自何时，也不知它终于何日，大半在“五四”前后它不言不语地自行消逝了。

“五四”前，我在四中学习的三年内，国外的大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，国内是军阀混战，中间还穿插了一幕张

勋复辟的丑剧，学校里则静如止水，教师和学生按部就班地上课下课，开学放假，对那些事件不曾有过什么显著的反应。教师大都朴素无华，按照课本讲授，我从中得到一些应得的知识，但他们不能使我对他们所教的课程发生更大的兴趣，有时还感到沉闷。与此不同的是教数学的黄先生^①和教国文的潘先生^②，我们上这两位先生的课时，精神格外集中，课堂内的气氛格外活跃。黄先生讲解数学，浅近易懂，善于引导学生解决难题而且要求加强速度，使我这一向对数学感觉迟钝的人对代数、几何也有了爱好。潘先生，我在回忆性的文章里不只一次提到过他，这里我还要重复几句。潘先生评文论事有独到的见解，他有中国正统思想以外的一种反正统精神，他讲《韩非子》时，批评孔子，讲《史记》时，反复发挥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”这句话的意义。他常嘲笑《古文观止》里的文章，如今回想起来都有些过分。他并没有当时已经问世的《新青年》所传播的进步思想，但是他在我的头脑里为我在“五四”后接受新文化铺设了一条渠道。

“五四”运动一起始，静如止水的四中立即掀起波澜。1919年的5月4日是星期日，第二天星期一我走进校门（那时我还是走读生）便看到全校沸腾，气象一新。“打倒卖国贼”、“废除廿一条”、“收回青岛”等等的小条标语转瞬间贴遍了墙壁和树干。紧接着是走出校门，宣传讲演，自动地成立学生会，派代表参加学生联合会，罢课游行，跟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进行斗争。

暑假后学校开学，教师却有了变化，我们最尊敬的两位先生离开了我们。潘先生因为在《益世报》上发表一系列支持学生运动的署名社论，被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判处一年徒刑，黄先生调往北京另一个中学去当校长，他们介绍了两位教师来接替他们。黄先生介

① 黄先生即黄自修先生。

② 潘先生即潘云超先生。

绍的,据说是他本人的老师,可能姓陈,我记不清了;潘先生介绍的是他的学生,姓施^①。我当时想,黄先生的老师必定比黄先生有学问,不料这位老师,不善于教学,上课就讲,对学生从不发问,跟学生毫无联系,他在讲台上讲他的,学生在下边干学生的,使我这对于数学有了爱好的学生又恢复了迟钝。我上了一年“三角”课,也买了一本《盖氏对数表》,结果是茫茫然不知“三角”为何物。如今我真难以想象学期结束时,这门课我是怎么考试及格的。可是直到现在,还常梦见自己对“三角”一无所知,便无可奈何地走进考场,最后是从焦急中醒过来,才算是得了救。与“三角”课相反,是施先生的国文课。施先生向我们介绍西方文学的流派,讲解《庄子》,扩大了我的眼界,活跃了我的思路。他年轻,却很认真,对学生要求严格。他常说写文章要简洁,不要拖沓。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,力求“简洁”,自以为一定会得到好评,想不到作文簿发下来后,打开一看,有这样的评语:“写得上气不接下气,什么事催得你这样忙。”我一时真是大失所望,再转过来看一看这篇力求“简洁”的文章,才渐渐认识到这样的评语是份所应得的。因此我对施先生更增加信任。这两位先生教学效果的不同,在我中学临毕业时解决了将来“学文乎、学理乎”的问题。

一些传播新文化提倡新文学的报刊杂志,在“五四”前我们连名称都不知道,这时都不胫而走地进入了宿舍和课堂,我们从中学到了许多过去不懂得道理,也获得不少从前难以想象的知识。这些道理和知识虽然还有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狂言谬论,但我们只要阅读后略有领会,便如大梦初醒。当时一些醒了的青年,觉得既然醒了,就不仅要读要听,而且要说要做的,全国各地的新文化刊物便雨后春笋一般成长起来。北京的中等学校中,高级师范附属中学

^① 施先生即施天侔先生。

出版了《少年》，赵世炎烈士曾经是这刊物的创办人之一；北京师范大学有人组织“觉社”，也出版一种刊物。我和同班的几个同学看到这种盛况，跃跃欲试，经过几度商量，在1920年寒假后也决定办一个小刊物，命名为“青年”。我们不知天高地厚，只觉得自己有话要说，不愁没有文章，最大的困难是印刷费从何而来。我们都是穷学生，怎么省吃俭用，也拼凑不出印刷费用，虽然每期只需要十几元钱。惟一的办法是拿着募捐簿向教师们募款。我们先找校长，校长写下了四元，这就等于给应捐的数目定下了“调子”，随后找各位教师，一般都写二元，也有写三元或四元的。我难以忘记的是一天晚上，我和另一个同学走到施先生的屋里，向他说明了来意，他毫不迟疑，拿起笔来在簿子上写了“十元”。施先生只教我们一班，教师中他的工资是比较低的，他这样做，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，我们很受感动。

刊物出版后，其内容的幼稚、浮浅，自不待言。但那时有一种风气，只要是提倡新文化、反对旧礼教的刊物，便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”，不管刊物的水平高低，彼此都亲如同志，因为面前存在着极为浓厚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侵略。我们把《青年》寄往全国各地新刊物的编辑部，在封面印上“请交换”三个字，各刊物便源源寄来。我们收到的刊物，质量不知比《青年》高出多少倍，这是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。但有时也招来一点麻烦。有一次收到河南开封省立第二中学几个同学的来信，大意说，他们办的刊物也叫作“青年”，出版在我们的《青年》以前，为了避免发生误会，要我们改换刊名。我们的刊物已经出了两期，不便改变名称，只好在《青年》下边加上了“旬刊”二字。许多年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开封二中《青年》是曹靖华和他的几个同学创办的。

我们效法《新青年》，在一般性的论文与艺术作品后，每期写有几条随感录，批评社会上或学校内不良的风气。批评社会，没有人

反对,有时还受到称赞;谈到校内时,便有人提出质问,“你们办刊物是专来骂人的吗?”这使我懂得了一种“世故”,批评的对象越带有普遍性,人们越觉得与己无关,只要略微触及具体的人或事,就会有人受不了,给以责难。《青年》出了四期,便因经费告竭停刊了,它思想浅薄,文字幼稚,一无可取,至多不过是在新文化战场的边缘上起了点摇旗呐喊的作用。可是它在我的思想里播下了一颗以办刊物为乐事的种子。

《青年》停刊后,我四年旧制中学的生活也接近尾声,经过了一段不太紧张的毕业考试之后,我不无留恋地离开了第四中学。

如今四中早已不是我所描绘的当年的容貌了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四中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,由于历届师生的努力,它的教学成绩在北京享有盛誉。最近又建筑了新的教学楼,增添设备,进行现代化的教学,匾额“漱石”的小亭和简陋的教室想已不存在了。可是我只能按照个人的经历谈那既辽远又短暂的四年内的一些往事。虽然如此,这也可以说明,在中国最黑暗的时期,有些教师怎样勤勤恳恳地教学,给学生以启迪,有些青年是怎样向往光明,“五四”运动是怎样神速地促进了他们的觉醒。我已年过八十,我写这篇回忆,设身处地,好像还怀有在四中作学生时的心情。人们常说,写回忆是老年人面前无路可走的一种征象,我这时却觉得,回忆可以使人再现青春。

祝四中随着时代不断前进,永葆青春!

写于1986年4月13日